



· 中国文化典籍 ·

中国古代的 编年体史书

陈秉才 高德





祖国丛书

· 中国文化典籍 ·

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

陈秉才 高德

人民出版社

(双出马)件丛国联

辞典史文國中

(下上)國聯治政下

《詩經注》與《詩經印》——

日方國聯治政下

文書甲

書聯治國中

封 封面设计: 郭振华

書聯治國中

合 詩

金聯治國中

世 書

非聯治國中

卷本經

聯治國中

卷一四

具時非治國中

卷二書

學文非治國中

卷三書

非治國中

卷四書

附事——平治非治

卷五書

出 世 甲

木家治國中

五只治國中

· 中国文化典籍 ·

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

ZHONGGUO GUDAI DE

陈秉才 高德

BIANNIANTI SHISHU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03,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6,700

书号11001·861

定价0.88元

目 次

给读者的话……………(1)

——为什么要介绍编年体史书；什么是编年体；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与作用

一、编年体的萌芽……………(7)

——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编年体是怎样产生的；甲骨文、历法的作用；古代史官的职责

二、百国春秋与编年体的诞生

……………(17)

——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初具编年体形态的《尚书》；孔子修《春秋》；《竹书纪年》的残存

三、突破性的改进……………(43)

——《左传》的诞生；完善的叙事；史评方法的创立；思想性的重要突破

四、成熟与缓慢发展……………(65)

——《春秋》的余波——《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汉纪》的贡献

五、黄金时代的代表作……………(76)

——《资治通鉴》—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
产生；司马光的生平；编纂《通鉴》
的宗旨与方法；《通鉴》的史学贡献

六、“《通鉴》学”的兴起与 编年体的流变……………(106)

——“《通鉴》学”的起源；续《通鉴》的潮
流；改编《通鉴》的两个流派；《通鉴》
的功臣胡三省；王夫之等人对《通
鉴》的评论

七、实录的产生及存亡……………(136)

——实录的起源；起居注的价值；起居
注与实录的异同；历代实录的存亡；
实录的真伪；结尾的话

附录一：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简表 ……………(159)

附录二：“《通鉴》学”著作简介 ……………(167)

后记……………(172)

给读者的话

——为什么要介绍编年体史书；什么是编年体；
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的
地位与作用

古往今来，多少人面对数不胜数的典籍，总不免望洋兴叹，不知从何读起，这一矛盾今天亦然存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我们之所以按照体裁系统介绍史籍，有二点考虑。首先，体裁最能反映中国史籍系列化特点，抓住一种体裁，就可以顺藤摸瓜，掌握一系列的史籍，收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从体裁入门，按类探索历史文献的特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中国古代有个叫郑樵的史学家曾说过，学者最要紧的治学方法是“贵在知类”，“由流而溯源”，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思就是说治学必须首先弄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类属，辨明各个学术流派的界限，以及每一个学术派别产生发展的源流，这是治学基本途径。今天我们要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及各断代史、专门史，都应以熟悉历史书籍的类型为基础。如果对历史文献的类型盲

然无知，就根本无法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如果熟悉了各类型体裁，就可以顺利查找所需资料。查系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资料，可读纪传体、政书、类书等史书，查某一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可读编年体史书，如此等等，都需要借助对史籍体裁有了如指掌的认识。可见，掌握体裁，乃是读史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

其次，介绍史籍体裁，有助于发掘历史遗产，利用旧体裁、改造旧体裁，促进现代论著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编年体是中国第一种史书体裁，到近现代以后，编年体史书已经不甚发展了。但是，还能不能用古老的编年体史书体裁，来编写近现代历史呢？这需要对古代编年体进行分析，总结其利弊，摸索出利用旧体裁编写新历史的途径，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

编年体是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的编纂方式，用晋朝经学家杜预的话来说，就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以便记远近、别异同。这是古代对编年体的最早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记事首先标明年代，年之下记月份，月份之下注明日期，日期之下记述史实，这样就可以区分史实的先后顺序和彼此的异同。这种解释，就形式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还没有揭示出编年体体裁产生发展的规律，还不能使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编年体史书的特点。以后的史学评论家们，如唐朝的刘知几、清朝的章学诚以及近代的梁启超等人，都对编年体史书进行过一定研究和评说，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没有能够对编年体

裁做出历史的总结。今天，随着历史科学的长足进步，史学史这门新的分支学科的建立，以及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系统认识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也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为了帮助广大史学爱好者熟习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有选择地阅读编年体史书，有必要就编年体史书产生、发展的历史做一简要介绍。

在介绍正文之前，这里还需说明一下编年体史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以便大家从总体上认识编年体体裁。

中国和世界史学的历史表明，按年月日记事，是人类最早用以编写历史的方法，可以说，编年体是古代史籍之源。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其中就有大量按年月日记事的例证，中国现存最早的史籍《春秋》，就是编年体史书。在希腊，被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30年所著《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记述希腊与波斯战争，用的是编年记事法；公元前411年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在英格兰，被称为英国史学奠基人比德所著《英国教会史》、出于众手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都是按年记事；在德意志，最早的史书是兰伯特的《编年史》和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在俄国，最早的史书是奈斯托尔的《编年史》等。诸如此类，都说明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最初的历史书籍一般都是采用编年体编撰的，几乎没有例外。这说明史学始于编年体，也表明编年体在中国和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其中，中国编年体产生的时间，又居世

界首位。孔子修《春秋》约在公元前481年，比希腊“史学之父”的编年史还早五十多年。就是春秋、战国间成书的《左传》，也在公元前430年之前。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创立编年体的国家。

中国古代编年体在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有二点应特别指出，一是在编纂法上的开创性，二是对后世各种体裁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开创性使它成为古代第一大史籍体裁，成为古代史籍产生的标志，成为中国史学之源。对后世体裁的影响，是指编纂方法上编年体对各种体裁的基础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各种体裁都从不同角度采用编年记事方法，使编年体成了各种体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籍有许多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多样性和连续性，而这两个特点又与编年体的发展、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多样性，是指体裁类型多。中国古代史籍体裁除编年体之外，还有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类书体、史评体、史考体、方志体、传记体、文献汇编体等等。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各种体裁之间的区别和特性。但是，多样性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指编年体存在于各种体裁之中。换言之，就是各种体裁包含着编年记事方法。如纪传体中，本纪、世家、年表、书志等体例，大体是采用编年记事法的。又如纪事本末体，虽然是以事为纲，但是，每一标目之下，分别按时间顺序记事。其他如典志体、传记体、方志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编年记

事方法。可见，编年体已经渗透到多种体裁之中，并且成了古代史籍编纂方法的基础。

所谓连续性，就是指一种体裁的诞生，后人往往都连续仿作、续作，形成按朝代相继，或者按体裁仿作的一系列历史典籍，如《春秋》、《左传》之后，有《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史记》之后有二十五史；《通典》之后有十通；《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纪事本末体相继产生。这样，中国古代的史籍便形成连续性、系列化特点。这种连续性的形成与推进，又与编年体的演变密切相关。如《史记》，在编写方法上对《春秋》、《左传》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通鉴纪事本末》又是在编年体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说明编年体和其他体裁的典籍都具有连续性发展、演变的特点。而且，编年体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体裁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籍和其他史籍一样，具有“资鉴”和“风教”作用。纪传体以其记帝王将相为特点，被钦定为“正史”，它的“垂训”作用自不待言。编年体虽未取得“正史”之名义，但它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地位和“正史”具有异曲同工之效。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说得很清楚：“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正史者，以班马（指班固、司马迁）旧裁，历年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

今而仍搜罗遗帙，次于正史，俾得相辅而行。”^①把编年体视为正史，不始于《四库全书总目》，刘知几早就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把《春秋》、《左传》看做古代正史了。《明史·艺文志》在正史类目之下，也收录编年体史籍。这说明纪传、编年二体在内容上均具正史性质。《资治通鉴》一书由皇帝敕撰、命名一事，也充分证明编年史也具有御用性质。这一点是应充分认识的。

总而言之，我们介绍编年体史籍，揭示其特点和产生发展的过程，不仅可以使读者加深认识古代史学的起源和特色，还可以帮助各类型史学爱好者选择阅读目标、搜集历史资料，提高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激发为振兴中华而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情。

①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序》卷四十七。《史通》：唐刘知几撰，二十卷，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全面论述唐以前史书的优劣得失，提出了史学家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史家应加强才、学、识的修养，被誉为史官之座右铭。《六家》：《史通》篇名。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学家。

一、编年体的萌芽

——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编年体是怎样产生的；甲骨文、历法的作用；古代史官的职责

人类编年记事方法源远流长，但是，不能把所有标有年月日的记事文献都视为编年体历史书籍。编年体史籍在编纂学上是有严格标准的，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编年体正式产生以前，确实存在大量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历史资料，这些无疑是编年体产生的条件，但是，由于它们未经选择加工，也没有按一定程序编排组织，还不是完备的编年体史籍体裁，只能说是具备了编年体的某些因素，充其量也不过是萌芽状态的编年体原始文献而已。

完备的编年体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文字、历法、史官记录的标有年月日的文献、编撰宗旨、对文献的抉择取舍和编排格式。如果只具备其中的部分因素，就可以视为不成熟或不完善的编年体，即编年体的萌芽。这五个条件就是我们区分编年体萌芽和产生的主要分水岭。

中国编年体的萌芽时期大体上可以划在夏、商、周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按年月日记事的历史文献，还没有出现完

备的编年体史籍。我们说它不完备，是因为它们只有五个条件中的两、三个条件，是初级形态的编年记事文献、编年体的雏形。因此，我们把这个时期看做是编年体的萌芽时期。

文字是一切书籍产生的先决条件，任何历史文献都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逐渐出现的，其中按年月日记事的文献又是较早出现的。在没有文字以前，人类依靠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原始方法帮助记忆。但是，原始的方法不能记载复杂而长久的事件，更不能说明事件的原委，甚至还可能发生错误的记载、错误的解释。为适应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的需要，文字应运而生了。人们凭借文字可以把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记录下来，并借助文字材料，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交流活动，进行新的斗争，以便取得新的成果。这些文字记录，就是历史书籍产生的基本条件。

文字是劳动的结果，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产物。统治阶级需要用文字记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向臣民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最早的文字材料总是和国家的产生相联系，中国现存最早文字甲骨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文字，文字结构已达到相当成熟地步，可以断定它决不是原始文字。在此以前，商朝初期、夏朝中晚期，应当是文字的产生时期，可是，迄今尚未有所发现。据有关文献记载，夏朝是存在文字史料的。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夏礼”可能就是用文字记载的国

(上缺)貞翌日酒獲口卣月。一月。前七卷世二葉四片。

辛卯卜即貞王賓暨不雨。貞二宰二月。後上廿七葉十三片。

(上缺)貞(缺)庚日宰教亡父在三月。明三六片。

出于妣辛罔暨其至(缺)祖。四月。前一卷廿六葉六片。

丙中卜行貞父丁日物在五月。明六葉七片。

癸亥卜大貞王賓口口日亡(克)六(月)。明四三。片。

乙巳出斗時。七月。前七卷廿八葉二片。
明八片。片。祭名。

丙中卜貞事尊氏羊世卯三宰。能一牛于宗用。八月。林二卷王
葉十一片。

軍寅卜旅貞翌乙卯口日。卯三宰。口世。八月在唐。明八四片。

乙卯卜行貞王賓后祖乙日宰亡父在九月。林一卷十二葉十五片。

家文献。《吕氏春秋·先识》曾记载说：夏朝末期，桀荒淫无道，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太史令（即史官）终古拿出国家法典文献，痛哭流涕的劝谏夏桀，希望他按国家法度治理国家。尽管夏桀未纳忠言，亡了国。但是，这说明夏朝已有史官，已有了文字记载的国家文献。这时的文字及文献形态，因无可靠地下文物佐证，难述其详。

商代的甲骨文献，有了明显的进步，从文字结构到文献记事方法，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依据。但是，从史学领域看，甲骨文只是一些原始的历史文献，是没有用成熟的史学体裁编纂的官方文书档案，还没有形成完备形态的历史书籍。我们可以从甲骨文献中找出大量的按年月日方法记事的事例，能够看出原始形态的编年体文献，但是，还没有发现用一定理论和方法编撰成的史籍。大量的甲骨文含有记时、记事、记人等方面的内容，说明甲骨文献具备了史籍基本要素和编年体记事形态。读者可以从甲骨文记事图中看到，甲骨文献记事形式已经趋于系统化，说明当时记事已有一定程式，即日后记事，事尾署月份，而未署年。这种程式与后世的依年、月、日次序记事格式有很大区别。就此形式来看，也说明它尚不规范化。这种记事方法的原始性，是由于这些文献出自卜人（即史官）之手笔，是随时随事写刻而成，一事一记，不加整理，是最原始的官文书档案。图中反映的材料是编年性典册的例证。又据三十年代发掘的安阳第三十六坑甲骨遗址，经专家确认，坑内遗物为全年卜辞，说明当时是按年收藏甲骨。学者们还指

出，龟版尾部有孔，孔稍上部位有“册六”、“编六”之类符号，这是“贯韦编册”的证明。^①这种按年保存、编连成册的档案，都是未经史学家整理的文献，虽然具有编年典册形式，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史籍。

甲骨文献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形成必须是文字、历法、史官三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没有文字就没有一切形式的书籍、文献档案；没有历法，就不能推算时间、确定事件发生的岁时年月日，也就没有编年体的产生；没有史官，就不可能产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甲骨文献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商代文献已经具备编年体的三个基本要素。

甲骨文中的历法是商代通行历法。这个历法较夏代历法进步。中国最早的历法产生于夏代，战国时流行的《夏小正》一书，基本上反映了夏代历法。当然，人们根据日月运行规律、月盈月亏的周期，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一个月分为二十九天或三十天，并以此安排农业生产^②，可以远溯原始社会末期，到夏代更加精确完备，历法不仅用于生产，而且用于记事。《诗经》中的诗歌多用夏历，《竹书纪年》也使用夏历记年，说明夏历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③甲骨文中使用的历法比夏历更

① 贯韦编册：韦即熟牛皮。贯韦编册就是用熟牛皮条把龟版、竹条编联起来，使之成册。这里指的是编联龟版。

② 《诗经·豳风·七月》中系统地记载十二个月的农业生产活动。

③ 《论语·卫灵公》。

加精确，其中不仅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而且还有十三月的字样，说明商朝人已经懂得闰月的有关知识，也说明当时的天文和数学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这些历法知识为按时记事提供了可靠根据，可以说，没有历法就不可能有编年记事方法。因此，我们把历法视为编年体的第二大要素。

史官记事制度促成了编年体的萌芽。关于史官记载，已屡见于文献。据说黄帝的史官仓颉，据鸟兽足迹，初造文字。^①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②这三人也是黄帝的史官。这些记载显然是传说性质，是靠不住的。一般说来，史官制度建立于国家产生以后，不可能出现于原始社会。《吕氏春秋》除记载夏桀的史官终古之外，还记载了商代末年纣王的史官向挚，他看到纣王穷奢极欲、暴虐荒淫、不可救药，便装载了他保管的文书典册，逃亡到周族。这应当是可信的。《尚书》、《逸周书》、《周礼》、《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典籍都有大量关于商周史官记载，基本上是靠得住的。《周礼》中有关史官名称就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等。这些都可以从实物中得到印证，甲骨文中有史字，有作册、太史、内史、尹等史官职称的记载，西周金文中，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称呼，这些与文献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

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史”字，其结构也可以证明史官是

① 许慎：《说文解字·序》。

② 《世本·作篇》。